

官者，多不能執筆花押，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。宰輔及近待官至一品者，則用玉圖書押字，非特賜不敢用。然則玉圖書有品級限定。今傳世銅元押，皆士庶所用也。而近來肆上所售，偽者尤多，大半皆北京古董商人以銅砂仿製者。

## 市書日記

紀果庵

日記輟筆，迄已七年。知堂翁打油詩云：「不是淵明乞食時，但稱佛陀省言辭。」此亦省言之一道。「文史」徵文，無以應。念近日偶買一二殘叢小書，隨筆記經過其上，未嘗不可代表生活鱗爪，姑抄數段，以作補白。

### 古香齋鑒賞春明夢餘錄

此書余擬買數年，庚辰北中書友云有竹紙本，索至二百餘元，以彼時米價，未免太昂，遂暫置之，豈知遂爾四年。月前解后問經堂陸君子西，謂適收一部，不旋踵售出，更增懊惱。乃函北平寶銘堂詢之，秋節後得覆，正有此書及萬曆野獲篇，合共聯券五百，夢餘錄二百四十元，以折南幣，才千餘，又開化紙初印原裝，毅然買之。數日間傳聞北書禁寄，扣留良多，正以為憂，十月十六日陰雨

，余方蹀躞太平路上閱肆，歸來此書已寄到，計四函廿四冊，絹面原裝，函亦絹製，惜稍捐裂，蓋郵包擁擠所致，書中箱本，而刊刻清晰，極可愛玩，當即抽取第一冊讀之，孫氏明末遺臣，其述此想不無哀思，故對懷宗，頗多美辭。余好研地方掌故，舊京乃第二故鄉，好嗜尤篤，雖以光緒順天府志日下舊聞考之枯澀，亦往往於枕上讀之，可消永夜。今此篇趣味，頗勝諸書，自應與原刊帝京景物略為寒齋二妙矣。十月廿一日記。

又本越縵堂日記，多記往寶名堂買書事，此寶名與寶銘不知是否為一。李南澗繆荃孫琉璃廠書肆記并記此肆之名，其地址在琉璃廠橋之西，路北，今此店址在廠甸四號，余竟不能憶，究在何處。李記云：寶名堂周氏在路北，本寶仕籍及律歷路程記，今年忽購得果親王府書，二千餘套，陳列而陳之，其書精麗，俱鈐圖記。……繆記云：寶名堂主人李衷山，山西人，才具開展，結交權貴，為御史李蟠所糾，發配天津。漢陽葉氏藏書歸之，裝潢最佳。……如繆說李當即光緒間因與賀

壽慈結交被糾參之李鍾銘，乃遣回原籍，而非發配天津也。越縵堂日記光緒五年二月廿六日云：「上諭侍講張佩綸奏，山西人李鍾銘即李春山，捏稱工部尚書賀壽慈親戚，招搖撞騙一節，着該尚書明白回奏，次日賀壽慈奏稱：與李鍾銘並無真正戚誼，亦無往來等語。外間皆云賀之妾李所贈，今立以為夫人，而鍾銘之妻，賀之婢也。今亦冒五品封。賀日往來其家呼之為女，而鍾銘呼賀為丈人。……」又光緒五年三月三十日記云：「上諭：都察院刑部將李鍾銘訊明具奏，着照所擬杖六十徒一年，年滿解回原籍，嚴加管束。李鍾銘即李炳助，自惇邸以下，大學士寶鋆，載齡，尚書毛昶熙，萬青藜，李鴻藻等皆與之親暱，而鴻藻尤狎之，不止賀壽慈一人也，其造宅也，仗諸貴之勢，逼死其鄰人，無不知之，凡參奏查辦之巨案，多為之資緣消弭，居間取賄，外省大吏入京，無不以重金委之，張佩綸之疏下，朝士過慰之者，車數百輛，廠市為之道塞，今之定讞，投鼠忌器，避重就輕而已。」繆誤捏合其名字

爲李衷山，又說張氏爲李蟠。此不過由寶銘之名，而憶及故事，恐即使爲寶名之後身，其間亦不知幾易滄桑矣，言之易勝愴然。

### 同日補記

## 盤山志

盤山，余家鄉之山也，余族自河間徙冀北，閱三百餘年，久與河間不通聞。盤山爲京東第一大山，抑亦舊時畿甸名勝。乾隆時，特建行宮曰靜寄山莊，時時臨幸，去余家不五十里，竟未獲一登，今日乃去故鄉三千里矣，燕雲在望，澄清何日！聞山中勝地，悉付劫灰，山下居民，半屬旗籍，寶廬殘摧，舉家流離，縱有飛泉怪石，古寺奇松又焉得絕暢襟懷邪？此山志有二，一，康熙時智朴所輯，大略椎輪，未能完密，然智朴固與漁洋諸詩人往還，（見居易錄）要非俗流。二，乾隆御纂，差稱完備。余於去冬收得康熙志一部，板本模糊，不能愜心。今春友人張君見告，寶銘有乾隆志初刊本，索價北幣一百八十元，念得初刊匪易，勉強匯款購之。書

品極精，唯毛邊紙日久，有碎裂之虞耳。字作乾隆時御修書之松雪體，柔媚撲人，插圖不下四十幅，持與鄉人觀之，云酷似實境也。暑中熱甚，晚間解衣盤薄，於松風月色之下，輒閱一二章，可以消暑，雖非有用之典籍，於余却有佳趣，故爲記之。

十月十六日補記於篔簹軒。

## 獻詞 聞言

將這一期的「讀書特輯」編集之後，心裏還留下一些淺近的思想，這里姑且寫下兩點，也算代表本輯的獻詞吧。

第一要談的是稿酬問題。

上次雜誌聯合會議決，各會員刊物稿費以每千字三千元爲最低標準。雖然照前增加了點，（而且還有超過這數目的）但能否實行這決議，那還得看刊物主辦人的「雅量」。

記得陶亢德先生曾經寫過「要對得起一點作家。」指的便是關於稿酬的提高。蘇青女士也說，在自己的應該爭取的範圍以內，決不放棄絲毫。譚正璧先生因領不到配給米而憤然投

筆。最近胡蘭成先生也提起，張愛玲女士對於稿費之計較頗爲認真。

這都可見得稿酬及待遇之提高是如何的人同此心了。

文人的日常生活條件，原是極平凡的與其職業階層一樣。但人們之看文人，總成見地以爲非超然清高不可，最好是像王夷甫先生之「口不言錢」。（不過他還是用「阿堵」來代稱的）於是連極合理的要求稿費較量版稅也成爲有傷大雅，而且連累其作品價值的低降了。我想，與其悲悲戚戚的嘆窮訴苦，怨天尤人，而猶故示清高，何如爽快坦率的說了出來！

目前正是一個鑽營結託，巧取豪奪的時代，尤其是一些政治商業的識時俊傑，那一個不想擇肥而噬？而文人呢，既不能肩挑，又不能力耕，大多數秉着一枝金不換，在一燈似豆四壁蕭然之中，忍着炎威與寒肅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在拍賣精力，結果又所得至微。固然說不上對民族社會有什麼功勞，然而返求諸心，似乎也還不至怎樣的沒交待。更不幸的，以此寒微到連溫飽都談不到的報酬，在這是非混淆的當口，卻還要引得「悠悠之口」的評頭論足，而